

整風文叢

3

反党不股



社版出棉新



藝文叢書

3

反黨八股

紅棉出版社印行

目 錄

-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
-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一四）
-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八）
- 陳雲：關於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四三）
- 聯共黨史：列寧是怎樣進行宣傳的……………（五〇）
-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羣衆化……………（五二）
-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五六）
- 毛澤東：論宣傳的民族化……………（五七）
- 劉子久：關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信……………（五八）

毛澤東：

反對黨八股

二月八日在中宣部與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演說

鄧才凱等同志講了今天開會宗旨。我現在講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怎樣使黨八股做它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反掉，那它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到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最後地一將一軍，勢必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像「老頭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那已經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報紙，或印成一本書的樣子，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給大家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是早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罷，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美）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內戰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這話怎麼講？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黨教條，提倡科學與

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反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這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份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而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份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小部份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

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義向「左」要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種種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和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這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到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為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嗎？至於我們黨內的一部份（雖然只有一小部份）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麼，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發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民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清除；如果沒有對於這些東西的摧毀廓清，也就達不到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種東西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份子的狂熱性與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他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清除工作，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的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嚴重的給患病者一

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爲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叫他們好好的治療。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填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依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做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懶婆娘的裹脚布，又長又臭」。爲什麼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羣衆看，因爲長而且空，羣衆見了就搖頭，那裡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騙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龐大的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端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有十萬字。現在是全世界大戰爭時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報告，他們辛辛苦苦的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與首先的對象，是把那些又臭又長的懶婆娘的裹脚布，趕快扔到茅廁裡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仔細讀下去就是了。俗語說：「列甚麼名，唱甚麼狀。」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甚麼，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要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須要短文章，但尤其須要有內容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也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這裏包括了很壞的毒藥。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一。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却深怕人家駁，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得勝朝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我們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作「裝腔作勢」，一個叫作「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以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就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活動，如共產黨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一人的毒計，但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或自我批評的手段，這就是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但是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則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乃至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須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最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于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地位和「維他命」的目的，那更是卑劣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作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一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這樣一個標語：「互人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灣子，寫成了「互」字，人字却在右邊腳上加了二撇，寫成了一個「友」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

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目的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了，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的要作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詩的人家都看得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裡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嘲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酸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與牛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呢？真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對人民哇哇的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裡有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檢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一語言無味，像個書三一。上海人叫小康三的那批脚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翻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書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幾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都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替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喜歡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喜歡聽。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種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的，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書三一一樣，瘦得乾乾的，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學外國語言。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

就變成不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吸收外國的新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語言。比如「黨與非黨的聯盟」，這是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新憲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就吸收在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裡面，換成「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如此等類。總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不可。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的語言。現在民間的語言，大批是由古人傳下來的。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掘發，只要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當然，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這是定了的。但是好的，合理的東西還應該吸收。現在中黨八股過深的人，則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有用語言，一概不接受，不肯下苦工去學。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種同志，對於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覺。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這個毛病必須醫治。是什醫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吧，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用功學習，如果我們不學習羣衆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衆。」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你們去看看中藥舖子裡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麻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登，式，套，肆，第二是長小，二，三，四

，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刺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引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許多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看問題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常常引的這個中藥鋪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的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外部的標幟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內部的聯系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系的觀念，排列成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頭腦想問題，不去思慮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種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裡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就得行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側面，加以大畧調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畧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還不能夠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糊塗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知道問題底矛盾的所在，這裡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分析過程，因而不能發現基本的兩個矛盾側面所發生和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的矛盾側面，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說，如果重要的，帶指導性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與本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樣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方法，在我們黨內很

流行，所以給他指穿，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面，許多人不止洗一次，洗完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面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呵！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面固然也不好，洗後面上滯留着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不多看幾遍，像洗面之後再照鏡子一樣，就麻麻糊糊的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一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傻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黨八股的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禍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中討黨八股的徵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常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文字的形式。這種形式早已產生，但尚未充實，尚未獲得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黨八股之後，新的語言，文字的形式就可獲得

充實，獲得普遍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演說里面也有黨八股，開會也有。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一務使每地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麼？在會上作起「報告」來，則常常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愛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着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造麼？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了，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激頭激尾，激盪激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裡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與黨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眾化的人，而實是小衆化的人，就更要當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什麼大眾，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來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喚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去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衆化。

今天會場上激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裡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第一篇是從聯共黨史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作宣傳。其中講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裡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裡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裡，曾揭露廠主剝削虐待工人的事實，曾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曾寫着工人們底要求。這些

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肌體上的痛癢癢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辛苦的自由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傳單裡，曾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呵，是「揭露無餘」呵！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寫一個傳單，要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不然就是列寧也寫不出的。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嗎？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與群眾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是為群眾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百萬群眾底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群眾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用簡單的語氣，具體的口吻，用群眾所懂得的譬喻來和群眾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實在的，你們只要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多麼深奧呵！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的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但是我們總得照季米特洛夫同志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快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塞維克的法律：當你寫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意使每個普通工人都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着你來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是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法律」呵！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裡所選出來的，這是魯迅對北斗雜誌社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計子裡沒有什麼東西，硬要拉就麼？不調查，不研究，擡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之後至少要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Anna Karenina》（速寫），決不可將Anna Karenina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于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再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的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種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作文章的ABC。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看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難

、也看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都正是這些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不需要來說馬克思主義，縱令你把馬克思主義讀一萬本一千遍也還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還是一個「老風上誇」自己稱自己的假理論家。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叫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聽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緊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消除掉的。——這裡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裡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裡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入把六中全會會議的決定，當作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同它作對似的。中央現在通過了決定，一定要把洋八股、黨八股、教條主義等剷除。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加以分析，並要分析各人自己。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了的東西跟你愛人商量一下，跟你知心朋友商量一下，跟你同鄉同志商量一下，把自己毛病切實改過。這是我們的希望。

中共中央宣傳部

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

(一)十月十九日解放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規定了黨對於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於文藝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獲得一致的、正確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並使文藝事業本身得到更好的發展。

(二)小資產階級出身，並在地主資產階級教養下長成的文藝工作者，在其走向與人民羣衆結合的過程中，發生各種程度的脫離羣衆，妨害羣衆鬥爭的偏向，是有歷史必然性的，這些偏向，不經過深刻的檢討，反省與長期的實際鬥爭，不可能徹底克服，也是有歷史必然性的，這個真理已為各根據地的無數事實所證實。因此各根據地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把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問題，看成是有普遍原則性的，而非僅適用於某一特殊地區或若干特殊個人的問題。無論是在前方後方，也無論已否參加實際工作，都應該找到適當和充分的時間，召集一定的會議，討論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聯系各地區各個人的實際，展開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各地方與部隊中黨的領導機關，應該普遍負責領導所屬範圍內文藝工作者的這個學習運動，並檢討本身過去對文藝工作的自由主義或認識不足等缺點。須知只有經過這個檢討與批評，才能使真正屬於人民羣衆的文藝與文藝家成爲可能。

，而這種革命文藝與革命文藝家的產生，對於根據地人民事業是有重要意義的。又須知在今天的文藝戰線上與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的戰線一樣，不但存在着舊保衛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份子，而且還混有若干為敵人反動派派這的好破壞份子，他們過去利用我們的尊重文化人（這是對的）與若干同志中的由主義傾向（這是錯的）散佈思想毒素，進行反對人民的破壞革命隊伍與革命文藝隊伍的純潔性的活動，不經過認真的學習運動，並且這些份子覺悟，則文藝事業的發展與根據地的鞏固，都將遇到困難。

(三)在目前時期，由於根據地的戰爭環境與農村環境，文藝工作各部門中以戲劇工作與新聞通訊工作為最有發展的必要與可能。其他部門的工作雖不能放棄與忽視，但一般地應以這兩項工作為中心。內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應須易懂的話劇與歌劇（這是融戲劇、文學、音樂、舞蹈、甚至美術於一爐的藝術形式，包括各種新舊形式與地方形式）已經證明是今天動員與教育羣衆堅持抗戰發展生產的有力武器。應該在各地地方與部隊中普遍發展，其已發展者則應加強指導，使其逐漸提高，各根據地有演出與戰爭完全無關的大型劇和宣傳封建秩序的劇者，這是一種錯誤，除確為專門研究工作的需要者外，應該停止或改造其內容。報紙是今天根據地幹部與羣衆最主要、最普遍的讀物，報紙上迅速反映現實鬥爭的長短通訊，在緊張的戰爭中，是作者對讀者的最好貢獻，同時對作者自己的學習與創作的準備，也是大的益處，那種輕視新聞工作，或對這一工作敷衍從事，滿足於浮光掠影的宣傳，而不求深入實際，深入羣衆的態度，應該糾正。由於過去許多根據地的文藝運動，都曾有不適當強調提高，故在執行這兩項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針都應該特別着重普及方面。如戲劇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應放在培養地方與部隊的羣衆劇團或羣衆戲劇活動，新聞通訊工作者及一切文學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應放在培養工農通訊員，幫助心勵工農與農工部練習寫作，使成爲一種羣衆運動，在這一方面，專門化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刻覺悟到

過去對這個任務的不認識或認識不足，是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今後應以十分的熱情與恆心，來開始這個工作。在陝甘寧邊區，工農（首先是工農幹部，八路軍與工廠工人）的學習條件較好，更應以全力有系統地進行之。

（四）毛澤東同志講話的全部精神，同樣適用於一切文化部門，也同樣適用於黨的一切工作部門。全黨應該認識這個文件不但是解決文藝問題的教育材料，並且也是一般的解決人生觀與方法論問題的教育材料。中央總學委對此已有明確指示，關於根據地知識份子，大多數都是受過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文藝的深刻影响的，在他們中間，尤須深入地宣傳這個文件。

中共中央宣傳部 一九四三·十一·七。

附：

中共中央總學委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區黨委：

解放日報十月十九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各地黨收到這一文章後，必須當即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在幹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規定為今後幹部學校與各級幹部必修的一課，並儘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後方論的區廣大的學生羣衆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外人士中去。

中央總學委 一九四三·十·廿。

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於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藉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

在我們爲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奴隸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以至現在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量勝質」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出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藝是

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藝運動、在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紅軍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却沒有互相結合起來，彼此都是孤軍作戰，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原故。抗戰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等於與根據地人民的運動相結合，而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的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向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有這樣一些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決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是否還有認識得不正確或者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忘掉自己的正確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譬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那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還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朋友，還有一種是自己，這就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敵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他們「歌頌」呢？絕對不應該，因為他們都是萬惡的反動派。他們在技術上也許有些優點，譬如說他們槍砲好，但是好的槍砲拿在他們手裡就是反動的。我們武裝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槍砲奪取過來，轉過去打倒他們。我們文化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殘暴、欺騙及其必然失敗的前途，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朋友，對於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

我們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批評，就要反對。至於對人民羣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其背上的包袱，使他們能夠大步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而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對黨問題，就是文藝做給誰看的問題。在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與在大後方不同，與在抗戰以前的上海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份學生，職員，店員爲主，抗戰以後的大後方範圍曾行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爲主，因爲那裡的政府，把工農兵與革命文藝互相隔開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黨政軍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必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對象。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爲這部份人數目少，這比大後方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大後方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延安所看書的就有二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長久經錘鍊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爲要了辨他們，

熟悉他們，在他們裡面，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在新四軍裡面，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就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把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關了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描寫對象與接受對象不熟，或者簡直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工人，不熟農民，不熟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言語不懂，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語。我會經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羣衆不賞識，在羣衆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破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羣衆就既不買你的貨。你愛羣衆了解你，你要與羣衆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裡，我可以說一句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裡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中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比较渾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變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許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

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馬列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列主義。常談，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譬如說，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客觀決定主觀，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愛吧，在階級社會裡，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誠心地學習馬列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列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還要學習社會，就是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個別狀況，他們的面貌和他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裡開了三次，大家爲了追求真理，有黨的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爲這是對整個文藝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討論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

，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能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運動，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當中國打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堅決和對內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大批文藝工作者與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與大後方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與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麼，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們的問題「的中心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與如何為羣衆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或這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聯軍」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個問題為中心加以說明，同時也講到一些彼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 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說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所寫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羣衆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

些人是暫時的投機份子，甚至還有敵人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派來的掛着文藝招牌的好細份子，但是除了這些人以外，却都是在爲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據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從事工作的，許多則是還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羣衆的。但是爲什麼這就即使這小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爲着人民大眾而是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爲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爲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爲帝國主義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奴隸文化，奴隸文藝。還有一種文藝是爲特務機關的，可以叫做特務文藝，這種文藝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實質却不出上面三種範圍。在我們的文化不是爲上述種種人，而是爲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舊形式，我們是並不拒絕利用的，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的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是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與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農，即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

和隊伍的，這是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份，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還有抗日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我們應該聯合他們，但是他們不贊成廣大人民羣衆的民主，他們都有爲他們自己的文藝，我們的文藝不是爲着他們，他們也拒絕我們的文藝。

我們的文藝，應該爲着上面說的四種人。在這四種人裡面，工農兵又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革命堅決性較小，也比工農兵較有文化教養。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着工農兵，第二是爲着小資產階級。在這裡，不應該把小資產階級提到第一位，把工農兵降到第二位。而我們現在有一部份同志的問題，他們對於文藝是爲着什麼人的問題不正確解決的關聯，正在這裡。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就是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看得比小資產階級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些呢？我以為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知識份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去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去教育工農兵。有許多同志，因爲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份子，於是就只在知識份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與描寫知識份子上面。這種研究與描寫如果是站在無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是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寄與滿腔的同情，連小資產階級的缺點也加以同情甚至吹。對於工農兵，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是描寫，也是衣服是工農兵，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把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要，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

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聽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民間語言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爲着好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爲着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知識份子，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班同志的屁股還是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那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的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军，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是沒有澈底的解決。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却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澈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屁股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

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紛歧、對立、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紛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爲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與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羣衆，是有些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譬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军，新四軍，到羣衆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革命文藝戰線的不統一是因為缺乏共同目的，而這個共同目的就是爲工農。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澈底解決，因爲那些地方有人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農工羣衆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種

，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是讓隨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裡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彻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着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列主義，是黨案生活黨案鬥爭裡完全適用的、活的馬列主義，不是單單書本上的馬列主義。把書本上的馬列主義移到黨案中去了，成了死的馬列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二

爲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如何爲法，這是第二個問題，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得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爲什麼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出來了。因爲沒有弄清楚爲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爲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又有一個基礎，譬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有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存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高到

應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裡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它們的源泉是從何而來的呢？無論是那一等級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文學藝術的萌芽，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獷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有這樣的源泉，此外沒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與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也可以說是源泉吧，但這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這為第一位，便是顛倒的看法。實際上，書本和現成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與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見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鏡，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成為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作品時候的借鏡。有這個借鏡與沒有這個借鏡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借鏡。古人與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東西也必須借鏡。但這個借鏡不是替代，還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與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仿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和軍事上政治上哲學上經濟學上的教條主義的性質是一樣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

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地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手稿裡所說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總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地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後的文章却比自然形態上的文章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活的列寧比小說戲劇電影裡的列寧不知生動豐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寧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還要做許多完全和旁人一樣的事，而且能夠看見列寧的人很少，列寧死後大家再也看不見他了。在這些方面，小說戲劇電影裡的列寧就比活的列寧強。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羣衆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以神受感道，一方面是人到前人，人學前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羣衆感觸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羣衆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加工的文章，只有自然形態的文章，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章，所提高的文章都是加工過的文章。那末它還有什麼區別呢？它程度不同的區別。普及的文章是指加工較少，較粗糙。因此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羣衆所迅速接受的東西。而提高的文章則是指加工較多，較細緻，因此也較難為目前廣大人民羣衆所迅速接受的東西，現正上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與敵人作殘酷的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間的封建階級專制統治，不識字，愚昧，無文化，所以他們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們所急需的與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向他們作普遍的普及運動，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與堅強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同心同德地

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中送炭」的問題。所以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輕視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於被普及者，則普及還有什麼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一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一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牛斤八兩？這種普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裡，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地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導我們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導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會起破壞作用的。

除了直接為羣衆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羣衆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羣衆中的先進份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羣衆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接受能力比羣衆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於當前的和羣衆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滿足於「一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需要，暫時還只是幹部的需要，而不是羣衆的普遍需要；適應這種需要應該是一個方針但是不應該成為今天的整個方針或今天的

中心方針。同時應該了解，為幹部，也完全是為羣衆。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我們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文學藝術中間，就有從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藝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被提高了的羣衆所需要，或首先為羣衆中的幹部所需要的，比較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藝術，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藝術指導下的，為今日最廣大羣衆所最先需要的，比較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藝術（不是所謂低級趣味）。無論高級的或低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與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與普及工作的同志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為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為了羣衆。高爾基在「主編工廠」裏，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幾歲的兒童」，魯迅也用了許多時間與普通學生通訊。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嚮往，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歌唱，我們的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羣衆中最低級的文學藝術普及工作的同志發生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羣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豐富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成其為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之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羣衆，表現羣衆，把自己當作羣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羣衆才能教育羣衆，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衆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

的資格，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力，也是羣衆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定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是極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僞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羣衆的目前利益與將來的利益的統一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與最速爲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與目前的行會主義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部作品，只爲自己以及幾個朋友或少數人的集團所偏愛，因爲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羣衆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階級階級的功利，這就必須在較多的人們中發生較大的益處，才是較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也是貴族享用的東西，羣衆還是在那裡唱「下里巴人」，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寫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與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爲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爲清高，羣衆是不會批准的。

在爲工農兵與怎樣爲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一切問題，例如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剛結尾是不團結的問題，功利主義還是超功利主義的問題，狹隘功利主義還是廣大功利主義的問題，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爲這個方針而服務。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爲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綫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即一定的政治路綫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超黨的政治，與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階級有黨的社會裡，藝術既然服從階級，服從黨，當然就要服從階級與黨的政治要求，服從一定革命時期的革命任務，離開了這個，就離開了群眾離開了群眾的根本的需要。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份，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機器中的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斯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能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份強調，但也不能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偉大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份，是螺絲釘，與別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之分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如果說最廣泛最普遍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能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羣衆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思想戰爭與藝術戰爭，尤其革命的思想戰爭與革命的藝術戰爭，必須服從於政治戰爭，因爲只有經過政治，階級與羣衆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

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黨業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黨業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羣衆中去，爲羣衆所領受，以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與有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也是無產階級政治與有產階級政治的原則區別。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政治與政治家狹隘化，庸俗化，也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與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盟份子，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到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學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份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份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大概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系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就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裡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而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的右傾的投降主義，是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列寧所謂跛了腳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裡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工農兵。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對爲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戰線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就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够，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雜的問題，需要許多的專門的研究。我這裡只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零星問題或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舉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羣衆同心同德內，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的或較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羣衆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都是壞的，或較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與這兩者相反，我們一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爲大眾的動機與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爲個人的動機與狹小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爲大眾的動機與被大眾歡迎對大眾、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內行爲（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一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抗戰團結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樣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因爲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抗戰團結的，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爲自己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爲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即使是很高級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羣衆鬥爭

要求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有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世界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的理論。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與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與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階級社會與無論什麼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程度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排斥其反動的政治性，而只批判地吸收其藝術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含有某些藝術性，例如，法西斯的文藝就是這樣，內容感反動的作品愈帶藝術性，就愈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沒落時期一切剝削階級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政治內容與其藝術形式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藝術與政治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藝術的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着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爲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塗鴉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主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文藝理論基礎的所謂「人

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更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階級是社會使我們與無產階級處於同一命運，和我們的生活與無產階級打成一片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原無故的愛，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統治階級蔑視這個東西，孔夫十提倡這個東西，托爾斯泰也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歸於分裂，階級消滅後社會復歸於統一，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在現時則還是沒有。我們不能愛法西斯，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只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裡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沒有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爲「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是這種缺點只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與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頌詞與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缺乏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

優異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但人民的缺點不要地是優異者，剝削者，壓迫者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的文藝家們只應該把它作為優異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應該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只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笨的」，革命羣衆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把雜文和魯迅筆法僅僅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於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派，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份子以民主自由的決甘寧邊區及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可以大聲疾呼，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麼，「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能會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筆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朋友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三種態度各不相同。我們並不一般廢除諷刺，但必需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決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

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爲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人民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的愛人，再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的幾個脚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績，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與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立場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而顯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還是要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顯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或者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厲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爲是，說是「懂得」，其實是並沒有懂得的。

學習馬列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列主義，不過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列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學藝術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談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

，但是它們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列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並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那麼，馬列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三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羣衆等等的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厲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裡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舊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是那裡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目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一黨員「和一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爲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內部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爲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

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或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不許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向敵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耐不大能真正區別根據地和非根據地，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種地畝，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農民主義社會。到了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我們週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黨案相結合，不能有任何疑義。如果同志們在新的黨案中，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同志想：我還是爲大後方的讀者寫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根據地的小家碧玉與早已聽膩的老故事，他們希望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寫根據地黨案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法捷也夫的一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遊擊隊，它並沒有想法去投合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次後倒退的。

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羣衆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與羣衆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就是敵人，對於無論什麼罪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份子要與羣衆結合，要爲羣衆服務，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間，在今後長期的學習與工作中間，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許多爲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一定能够把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完)

關於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

陳 彭

（在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們！現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來講幾句話進行，我們黨的文藝工作者，在干幾年來，做了很多很多好的工作，對於中國革命和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貢獻，這是不容否認的。應該否認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講這方面的事情，我想講講旁的。講講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們中的兩個傾向，或者說兩個缺點。請同志們考慮一下，講的是否對？兩個什麼缺點呢？一個是特殊，一個是自大，這座樣東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應該去掉的，所以，從積極方面說，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講不要特殊，在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裡面，或者說寬大些，在我們文化工作的同志裏面，有沒有人感覺我是一個文化人，和旁的黨員不能相比，對黨的關係也要與衆不同呢？我看這個人是有的，不但他們自以爲特殊，旁的同志也當他們是特殊，這種現象不應該在黨內存在？爲要客觀這個問題，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麼資格做黨員的？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帶是黨員。這種黨員是以文化人資格入黨，而不是以千萬萬黨員中一份子的資格入黨的。第二種是基本上是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的分工，也許還有第三種，文化人又與黨員各半，不過這只是過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種看法或第二種看法發展的。黨對這兩種看法的態度怎麼樣？毫無疑問，黨是要求第二種看法，反對第一種看法的，因爲只有這樣，黨才能成其爲統一的無階級的戰鬥的黨，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資格入黨，我以軍人資格入黨，他又以農民資格入黨，黨就成了

個什麼樣子呢？黨就不成其為黨，成了各界聯合會。這是一個原則爭論，原則區別。黨是不是像共產黨，黨員是不是像共產黨員，原則分別就在這裡，可否來一個妥協？妥協就是幫助各界聯合會的成立，所以妥協的路是沒有的。那麼，黨員中間是不是還有分別？是有分別，分工就是分別。但是分工並不能作為特殊化的根據。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五十條黨章裡面，一條也沒有講起黨員分工以後怎麼樣，黨員就都是黨員，要說分工，倒個黨員都分了工，我們黨內就沒有了一個不担任任何具體工作的「單純黨員」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別的工作高一等？這是一天子重英豪，文齊教兩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點，而不是我們的觀點。我們認為凡是對羣衆對革命有必要的工，都同樣有價值，做了都同樣有功勞。一定要向什麼工作最必要？那麼，只有說勞動最必要，這才合於歷史的實際，而勞動者恰恰就沒有向黨向社會要過什麼特殊化。一定要求特殊，這個要求是前進的，還是後退的？這是後退的要求，這是要使先鋒隊的黨員向黨外老百姓的看齊，使黨向黨外向各界聯合會看齊。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這種後退的要求，同志們！或者還要問：那末，黨為什麼又要照顧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這不外是個用意：一個是因為分工的特點，每種分工都有它的特點，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軍事工作不行，用做軍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個人活動的東西要多一點，這在列寧的一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裡面說過，說得很好，如果不照顧到這一點是錯的。還有一個用意，是因為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點，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們，過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黨的教育比較少，和工農兵的結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識上不免產生一些弱點。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又人家長期照顧，到處對人家講我有缺點，你們要照顧呀！這就並不漂亮了！這是我要說的關於不要特殊的第一層。

這一層弄清楚了，接好就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要不要遵守紀律？這個問題，在大多數黨員是容易解決的，在文化工作同志方面，過去就有過一些麻煩，但是！如果我們的黨員不是

是請客似的請來等忙的，——這一種客是請不得的，請來也是越幫越忙的——那麼就要要緊國外的實行我們的黨章第四十四條「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可否不要紀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麼毛主席講的六個字「亡黨亡國亡頭」就一定不可避免。我們的黨是一個鬥爭的黨，我們在鬥爭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你說機關槍也是我們的武器，但是我們的機關槍又是那裡來的？是由有紀律的鬥爭得來的，並且愈是有了機關槍，就愈要依此紀律。連人作戰的時候我要向這裡衝，你要向那裡衝，大家都不聽總長的指揮，怎麼能不打敗仗呢？如果我們的黨沒紀律，大家爭論沒有一個止境，我們怎麼能有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怎麼能不亡黨亡國亡頭呢？紀律有沒有束縛性？我們的紀律基本上是自覺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個黨員偏不自覺，那麼怎麼辦？那就得來一點束縛。是不是這一下就把我們的天才束縛住了，我說不會，我們的紀律只束縛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妨害革命的東西，就像游泳術對於游泳的人只束縛他不要淹死一樣，真正的游泳家在水裡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紀律的革命運動裡也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是不起束縛了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決不會束縛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人，我們都承認是天才，但是他們是遵守紀律的模範，所以同志們對於這一條完全可以放心。同志過去對於紀律生活既然不很習慣，現在又要到前方鄉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紀律的問題上有什麼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我以為要特別注意真心的遵守和具體的遵守紀律的問題上。所謂真心的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頭上說要遵守紀律並不難，我們要求的是會場上這樣說，散了會私下裡也是這樣說，不但這樣說，而且這樣做。所謂具體的遵守，就是要在各種情形下面來遵守。我說要服從真理，服從革命，贊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說要服從無產階級，服從共產黨，贊成的人也不少，再說要服從黨中央，服從毛主席這也還比較容易；但是說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就發生困難。為什麼？因為這種人只能抽象的遵守紀律

，不具體的遵守紀律，具體的遵守紀律就一定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即使上級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從。做不到這一步，我們的黨就要垮台。因為假若誰都是覺得自己的本領強，自己的意見對，沒有一個約束，結果就誰都服從自己，不服從別人，而黨的統一，就完全沒有可談了。

第二個問題，文化工作同志要不要學習馬列主義，學習實際的政治？這個問題在大多數黨員也是不成問題的。做社會科學工作的同志，在糾正了教條主義傾向以後一般也要簡單一些。而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中間，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議論，有說做文藝工作可以不學這兩項的，有說學了反而妨礙文藝的，也有並不發議論就是不學的。但是我們的文藝工作不是叫革命的文藝工作嗎？要判斷我們的文藝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合不合羣衆的需要，除了學習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際，還有什麼旁的辦法？嚴格的說，任何文藝工作都是離不了政治的。譬如寫光明，寫黑暗的問題，就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問題，也是文藝上一個根本問題，不把這類問題搞通，我們寫出來的作品，怎麼能代表一個時代，怎麼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羣衆？所以那種以為作家可以不學習政治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否認文藝要服務於政治，服務於羣衆的意見。這個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藝座談會上，曾經詳說過，我現在不想多重複。我只還補充一點，就是學習政治不但於作品有好處，於作家爲人也有好處。政治可以使我們放大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們去一些小氣，少一些傷感。我們有些同志，一高興就是靈感，一不高興就是傷感，還叫做感情用事。這樣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虧。我們是幹人類解放大事業的人，就算廿歲加入共產黨，活到六十歲，不過四十年，一天工作八小時，只有十三年多的光陰，還要爲一點小事煩惱，不是太划不來了嗎？現在同志們到實際工作裡面去，這一點關係更大，爲要把工作做好，爲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團結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學習政治。

以上講不要特殊，現在再講不要自大。這與前面講的問題是有聯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爲自大，要反對特殊，就要進一步反對自大。我不是說文藝工作同志都自大，但是確有一部分同志有這

個毛病。毛病是由兩處來的，一是對整個文藝工作有了不合事實的估計，一是對個人成就才能有了一些不合事實的估計，這裡分別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覺得自己過去寫過很多文章，畫過很多畫，作過很多曲，因此很值得驕傲一番。這不是值得驕傲？我說絲毫值不得驕傲。如果說文藝工作是一個人的分工，那麼他對這門工作做得好，這是個盡了份內應盡的責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職，就是不及格。文藝工作的內容無非是群眾的生活和鬥爭，這些事情本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過是將它們用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沒有什麼可表現，為什麼表現實際便比實際做得更值得驕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多，大得很，譬如革命，就是使全人類翻一個身的大事，文藝就是能把這件事完全表現出來，對於人類歷史的作用，也還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並論，何況文藝家所表現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會覺得自己有許多讀者，有許多羣衆，因此值得驕傲，這個想法適當不適當？我看也可以考慮羣衆為什麼歡迎一個作家？主要是因為他的作品能夠反映他們的感情，所以一個革命的作家，一個和革命羣衆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羣衆的歡迎。如果有人把這種關係絕對化了，以為自己無論拿出什麼作品來，總是會有羣衆的，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不要說一個和羣衆走反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羣衆後面去了，也有被羣衆所遺忘的。並且我們還要估計一下，現在我們多數文藝工作同志，究竟有多少羣衆？應該承認，我們的讀者，還只是羣衆裡的一個很小部份，離開與廣大羣衆相結合，遠遠得很，在這個時候就忙着驕傲自己已有羣衆，就更加有害了。

我們不要把文藝的地位一般的估計過高，同時對自己個人在文藝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計過高。我們的文藝工作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觀的估計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見得能夠如此，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做「家」人家恭維他們是「家」他們不推人家不恭維，還急急於搶着自稱為「家」久而久之，

也就假成真起來，儼然成了個架子，這個架子是很不妙的，這是一個「包袱」一個負擔，背着它就不好往前進，我們的這些同志忽畧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小菜煮在鍋裡，味道聞在外面」。一個人的成就要靠羣衆的判斷和歷史的考驗，不是靠自己稱的。我們要口稱，何不上秤稱，看自己的知識够了沒有？沒有呢！我們的年紀還輕，知識還少得很呢！我們名爲共產黨員，但是對黨的知識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樣一回事？農民搞土地革命，搞農業生產是怎麼樣一回事？現在八路軍新四軍打仗，又是怎樣一回事？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識，就是社會的知識也很少。我們同志們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證券交易所也好，紗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什麼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聽茅盾先生寫「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許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麼交易所，就連在上海吃的大米是那裡來的，拉的大便是那裡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們的知識實在很少的。同志們！現在年輕知識少，不能成「家」還不奇怪，不可怕，可怕的是現在不學習，不深入羣衆，自以爲差不多，到了四五十歲以後，還是現在這個樣子，沒有充分的知識，沒有真正成熟的内容豐富的作品，這種自大的人就因爲不知道這個危險，所以自己不求進步，也不求旁人的幫助。他們最喜歡批評，最喜歡誇人批評，表面上說幾句「歡迎批評」有沒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戲，幕前都有人出來說：「我們這個劇排演時間倉促，技術上比較差，希望同志們「批評」！但是這類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說大半是假的。你要真正批評起來，那就成了仇人，他們心裡只許人家說好的，這樣人家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的態度：「是則是，非則非」的態度，既然沒法拿出來不如敬而遠之了。我們現在就要提倡這種同志的態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評。有些同志想實行自我批評，還不要喪失自己的身分嗎？恰恰相反，最不能實行自我批評的，或是自大的人，就最容易喪失自己的身分，自大的架子搭得愈高，跌下來就愈痛。斯大林說：「使布爾塞維克有聲有色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我們共產黨是一個照實際辦事黨的黨，說是一

個說老實話的黨，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也應該照實際辦事的，能够說老實話，聽老實話，這對於同志們自己及對於黨，對於整個新文藝運動都是有好處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講這兩點，因為是專講缺點，又是實行對同志態度，講的話也許不很好聽，但是我的意思爲同志們好，還是爲同志們壞，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講的缺點，也只是部分同志的缺點，就是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優點，頭一條就是他們擁護光明，反對黑暗，擁護工農兵，反對侵略者這是任何不革命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擬的，他們的缺點，也只是革命中缺點，從舊社會帶來的暫時的缺點，在革命隊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們的同志都是很聰明的人，這一回經過了整風，現在又到群眾中去做實際工作，進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話能够對同志們的進步有所幫助，那就是我最快的快樂了。

宣傳指南

列寧是怎樣進行宣傳的

（「聯共黨史」莫斯科版一九二二頁）

一八九三年末，列寧移居彼得堡。列寧在彼得堡最初的一些發言，就在彼得堡馬克思主義小組參加者中間刻上強烈的印象。非常精通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善於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當時俄國經濟政治環境的才能，確信工人事業勝利的熱烈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卓越的組織天才——所有這一切，就使列寧成了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公認的領導者。

列寧受到那些在他所領導的小組裡聽講的先進工人們熱烈的愛戴。

工人巴布石金，當回憶到列寧在工人小組裡上課情形時說：「我們所聽的講演，是帶有很活潑的，很有興味的性質，我們大家都十分滿意這些講演，我們講師的智慧，是經常令我們實敬佩服的。」

彼得堡的「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裡的情形的一——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裡會揭露廠主剝削虐待工人的事實，會解釋工人應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會寫着工人們底要求

。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總體上的窮苦癡結，關於工人們底必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日常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的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裡，曾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勞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一八七五年秋天，列寧寫了發給托爾通工廠罷工男女工人的傳單。這個工廠是屬於英國廠主們的，他們獲得了億萬的利潤。在這裡，工作日是延長到十四小時以上，而每個織布工人每月所領得的工資，却不過七個盧布。罷工的結果，是工人獲得勝利了。在很短時間中，「鬥爭協會」就印發了幾十種這樣的告各工廠工人的傳單和宣言。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

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羣衆化

「季氏文選」一〇七——一三二頁

我們需要組織羣衆來實行我們的決議。僅僅我們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響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的基本弱點之一，就是工人運動自發論的立場。我們應當剷除這種立場。我們應當記得：如果沒有百折不回、長期的、耐煩的、往往似乎沒有什麼效果的組織工作，羣衆是不會強流到共產主義的岸邊來的。爲了善於組織羣衆，我們就要學會列寧斯大林的領導藝術，以便把我們的決議不僅變成爲共產黨員所了解的東西，而且變成爲極廣大的勞動羣衆所了解的東西。應當學會與羣衆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思想，都要反映出千百萬羣衆底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麼，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會用簡單的語氣，具體的口吻，用羣衆懂得的譬喻，來和羣衆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實在的，你們只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寫得如何深奧啊，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用不著說普通工人了。

同志們，如果想一想：工人們尤其是在法西斯帝的國家裡，在散佈和閱讀這些傳單的時候，有犧牲自己的性命的危險，那麼，我們就能更加明瞭，在我們起草這些傳單的時候，必須使用爲羣衆

所懂得的文字，以便使得散佈和閱讀這些傳單時所遭受的犧牲，不致於成爲徒然無益的玩意。我們的口頭宣傳和運動，也是一樣。在這裡，應當老實不客氣地說，法西斯蒂往往比我們的許多同志還要靈活些、聰明些。

比方，我現在記起希特勒上台執政以前在柏林舉行的一次失業工人大會。當時，著名騙子和投機大家斯克累列克兄弟案子已經審問了幾個月，再三纏綿着。在這次失業工人大會上發言的國社黨的演說家，利用這案子來達到自己籠絡人心的目的。他歷數斯克累列克兄弟底詐欺取財，賄賂收買以及其他種種罪惡後，便着重說道，他們的案子已經纏延好幾個月，德國人民因爲審判這件案子已經化費了幾十萬馬克的金錢，像斯克累列克這一類的匪徒，是應當立刻槍斃的，而在審判時所花費的金錢，應當給失業工人。話還沒有說完，聽衆鼓掌的聲音，已經震動整個會場了。

當時有一個共產黨員站起來要求說話。大會主席最初沒有許可，然而，到會的人，却願意聽一聽聽共產黨員底意見，要求讓他說話，結果，大會主席只得許可共產黨員說話。當這個共產黨員走上台的時候，所有到會的人都聚精會神起來，要聽一聽共產黨員的演說者說些什麼話。但是，他說了些什麼呢？他提起嗓子說：

「同志們！共產國際執委會剛才才完結。全會指出拯救工人階級的道路。同志們，全會在你們面前指出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奪取工人階級底多數」（笑聲）。全會認爲，應當使失業工人底運動「政治化」（笑聲）。全會號召把失業工人運動提到更高的階段（笑聲）」。

這個演說者往下所說的話，也是這一套，他大概是認爲「解釋」全會底真正的決議。

這一種演說能不能够奪得失業工人呢？起初準備把失業工人政治化，其次革命化，然後再動員他們把他們的運動提到更高階段，這能不能够使他們滿意呢？（笑聲，鼓掌）

我當時坐在會場屋角裏。很痛心地看見：到會的失業工人，起初本來是很想聽聽共產黨員底說

話，以便從共產黨員底說話中得到指示，他們究竟應當怎麼辦，可是，當他們聽見我們這位演說者底話以後，他們便開始打起呵欠來，顯然感覺失望。無怪乎，當主席用粗魯態度停止我們的演說者底發言的時候，在到會人的中間，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

可惜，這並不是我們的鼓動工作中唯一無二的例子。這一種事情不僅在德國有過，同志們，這樣去鼓動，這就是鼓動他人來反對自己。說得客氣一點，也不過是小孩子的鼓動方法。永遠拋棄這種鼓動方法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我們作報告的時候，主席薩西甯同志，從大會場上收到寫給我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很值得注意的。我現在把這封信讀給你們聽。這封信上寫道：

「我請你在說話的時候，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將來的一切決議案，都應當用很通俗的文字寫出來，以便不僅受過訓練的共產黨員懂得，而且無論那一個毫無訓練的勞動者，讀到共產國際的材料時，立刻就懂得；共產黨員願意什麼，共產主義給人類以什麼好處。在我們黨內，有時上層份子忘記了這件事情。應當使他們記起這件事情，而且應當使他們很牢固地記起這件事情。共產主義的鼓動，也應當用通俗易曉的語言來進行。」

這封信的作者是什麼人，我不很清楚。但是我毫不懷疑：這一封信表示了千百萬工人底意思和願望。許多同志認為：高深的話，羣衆不懂的公式和提綱，越是用得多，則他們的宣傳和鼓動也愈好。他們忘記了：正是現代工人階級偉大領袖和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在說話和寫東西的時候，總是用廣大羣衆最了解的語言和文字。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做布爾塞維克的法律。

當你寫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意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

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章）。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答北斗雜誌社問，「魯迅全集」，卷四。三五三—三五四頁）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却不會寫「中國話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預草寫一點在下面：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來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速寫），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出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復，即請編安！

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

（「論新階段」，一〇二——一〇三頁）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成爲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份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統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劉子久：

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淮北區黨委諸同志：

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已經是四個月。這是我入黨以來第一次。學習方法是用反省的方式。去聯系實際，去檢討過去自己及黨的各種政策與工作。在反省的過程中，特別着重在思想方面，求得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現在就將我近來在學習中反省到的幾個問題寫給你們看一下，是否對，尚不敢十分自信。只是證明我近來在學習中所引起的思想上的變化，尚望予以批評指正。

(一) 從「走夏陶然的路」引起

夏陶然同志，據說是我們廿五團的一個偵察員，因身體不好，在前年實行精，政策時，把他精簡下來之後，就把他派到泗縣峯山區中澗小學去當校長兼教員。這個小學是早已被人家辦「滑了一（壞了之意）；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這個村莊太窮，學生念書與他們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困難）不能解決，所以常常是冇先生，無學生，毫無生氣；而過去的一些先生們，則給這個村子的羣衆加上了一頂「落後」，「不開通」的帽子，以掩飾其辦學的無能。夏陶然同志到了那裡之後，從他同學生及學生家長的親切談話與自己的親身經驗中，很快就看出了這個矛盾，并想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方針與辦法：方針就是把學生的學習與生產結合起來，辦法就是把一二十個學生，按照他們的家庭與本人的情況，採用白蘭的方式，編成了幾個小組，如放牛小組，割草小組，挖菜小組，編筐

小組等。這樣實行集體與互助勞動的結果，學生除了念書之外，生產方面比較他們在家裡生活時的成績還大得多。於是在開學之後，曾被家長將留在家裡幫助幹活的學生，又送來了，有些從未去上學的小孩子，看到這種情形，其家長也要求把他的孩子送到學校裡去跟夏老師念書。因此學生的人數就逐漸的多起來了，學校也活躍起來了。校舍壞了，夏陶然同志就親自領導學生下手修理。對學生的管理方式，是個別小孩子在學習與生產中不積極或好吵架的，他也不用自己去打說的方式管教他，而是動員學生羣衆去批評他，勸告他，這樣一來，那些好調皮的孩子也老實起來，守規矩了。此外，夏陶然還利用了他那個老師的資格與地位，去爲學生的家中及村子裡的人排難解紛。他的文化程度頂多也不過是高小畢業生，可是他到中澗小學不過半年來的時光，就使得中澗附近真是婦孺皆知了。那個小學的學生及其家長，特別是那些小孩子們的母親，對於他們的夏老師的關心愛護，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得出來。去年陽曆六月間，二分區在前密（峯山區區署所在地，離中澗只有七里）開辦暑期小學教員訓練班，夏陶然也在那裡受訓。一個多禮拜的功夫，學生及其家長沒有見到他們的夏先生！小孩子們的母親們很關心他，於是就湊了三四個雞蛋，好幾斤鮮梨，打發了七八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乘着一隻小船，到前密去看他們的夏老師。當時正是漲水大漲，流速浪大，我也正在那裡作報告，看到這種情形，深爲感動。早在這個訓練之前，二分區召開的小學教育研究會，在所有小學教員的報告中，以夏陶然改造中澗小學的報告爲最生動，最惹人注意。許多小學教員聽了他的報告，都感到異常的興奮，發奇與羨慕。主持這個會議的潘琪與江凌等同志，都大爲感動，認爲這是一個新發現，於是就想把它宣傳一下，爲拂曉報寫了一篇社論，標題爲「走夏陶然的路」，這篇社論拿到區黨委審查時（我記得是在夏店子松樹林內的會議室中開民兵會議時大家傳看的），有的同志認爲這是有關我們方針的大事，中央及華中局都沒有這種的指示，我們不能這樣的提出問題，因而這篇文章就未用原題原文與社論的形式發表，因之，夏陶然的那套辦學方

法，當時也就未被我們採用與發揚。當時潘琪江凌等同志之所以這樣的提出了問題，恐怕也還不是由於他們真正在思想上完全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受了在解放日報上所發表的「吳滿有的方向」那篇文章的影響；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帶有一種樸素的直覺的性質，尙未能把它提高到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所以當時對這種意見紛歧的爭論，並不十分「重視」。然而「真理高於一切」，潘江等同志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幹部與羣衆密切結合，一切爲羣衆服務，從羣衆切身需要出發去解決問題，這個天經地義的真理，所以他們才這樣提出了問題。

最近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西北局、文協、教育廳所發佈的關於教育方針的文件，毛主席在延安開學典禮的講話，解放日報關於教育問題的社論中所提出的教育方針與一些模範小學與模範教師的介紹文章，與夏陶然所作者，竟不謀而合。這證明了夏陶然所走的路，正是我們在教育方面應該走的一條正確道路。夏陶然就是我們淮北領域中的吳滿有與趙占魁。

關於「走夏陶然的路」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某種觀點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但以今天的整風的眼光看來，則非同小可，這是羣衆創造天才的偉現。而我們當時處理這件事情的經過與態度，是反映了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辯證唯物論的革命性與創造性，是反映了我們的羣衆觀點與羣衆路線的不善，是反映了我們的不大相信羣衆的創造能力，是反映了我們的眼高手低，不肯向下，不肯向羣衆學習，是反映了我們不大懂得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問題。

我更進一步的回想了一下，在我們那邊，像夏陶然一類的人物，還有不少，如挖河工人中的周大華，災民中的榜子老漢（見七月廿日解放日報段佩的通訊），臨淮頭山東幣的輔教主任（名字我記不清，林丁同志曉得），其他如劉軍英雄，民兵英雄，模範戰士等等，如果我們認真的仔細的去檢查一下，還可發現許多。這種羣衆中的天才聖人、狀元、領袖、諸葛亮、本來就有，在我們今天

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土壤中，就更容易發生滋長，像吳滿有、趙占魁等新型的英雄人物，我想決不會只在陝甘寧邊區能出，只是因為我們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有毛病，未被我們所發現，黨與政府及軍隊內部的官僚主義，把他們壓住了，假偶爾被發現也未被我們所重視，而予以應有的發揚光大，夏陶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正如古人所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我們某些時候的某種情況，吳滿有趙占魁等人，與到了毛主席，高崗同志等這些伯樂，就成了轟動一時，名傳千古的英雄人物，其他與吳趙一樣的人物，假如沒有遇到一個伯樂，就淹沒無聞，與草木同朽了！但是，我們是最進步階級與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應該一變歷史上的狀況，就是說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許多千里馬，而且有很多的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

這種從發現與發揚各族各師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着手的思想與領導方法，不僅是推動與開展各種工作的一把鑰匙，一根槓桿，而且是一種發現與提拔幹部最好最重要的方式。經過這種方式所發現與提拔的幹部，其本身就是具備着聯繫羣衆及工作中的創造性兩個基本條件。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也比較用別的方式所發現與提拔者為大。而且提拔他們之後別的幹部也不能不服氣，去說怪話。因此，我希望我們能夠從上面這一個「小小的」具體的現實的例子中，得到一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啓示，並以之去教育與鼓勵我們的幹部黨員與羣衆，則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一定會引起一個很大的轉變與進步，不知你們以為如何？

但我們並不是說，夏陶然這個人就是十全十美，毫無缺點，他所採用的教育方針與辦法也已經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東西。相反的，恐怕他自己也還是剛摸索出來的這一辦法，還未自覺的把它提高到理論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在他還是帶有一種樸素的性質，還處於一種萌芽狀態。

但這一切，不可避免的缺陷與毛病，並無損於他這件事情之有偉大的意義，而我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正是因為我們不了解這件「小事」的偉大意義，而加以發揚光大，使之條理化，系統化，把它由不自覺的階段提高到一種自覺的階段，而這樣做，正是我們的領導機關應有的與主要的任務，我現在的認識如此，不知你們以為然否？

(二) 正確的口號，錯誤的方法。

我們很早而且不只一次的提出過創造模範村、鄉、連隊、支部的口號，並且訂出了具體的競賽，突擊計劃，但據我所知，迄我離開淮北時止，仍未能創造出一兩個真正稱得起模範的村、鄉、連隊與支部。即使有時創造出了一個半個，也僅僅是熱鬧一時，不久便消沉了，而未能堅持下去。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第一，就是由於我們不懂得，或者忘記了一個最簡單，最顯明並最初步的真理，即無論作什麼事，都是由人去作，都是由小處近處開始。因此，我們要想創造模範村、鄉、連隊……就必須從創造一批模範人着手，如模範村長、鄉長與人民，模範的連長、指導員與戰士，模範的支書、支幹與黨員……吳滿有與吳家棗園，劉玉厚與郝家橋，劉建章與區合作社，夏陶然與中遠小學，都是實際的證例。沒有這樣的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人物，自然不能創造出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事業，如模範村、鄉、連隊等。同時模範鄉村、連隊與模範人物是到處都有的，但是假若我們不去發現、表揚、提高、幫助這樣的模範鄉村、連隊……則這些模範鄉村、連隊與模範人物的發展，也就受到限制。我們是應當依靠着這些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去推動一切的鄉村連隊與各色人物，並創造出更多這樣的模範。這樣就叫做相得益彰，互相發展，而起決定的推動作用的是模範人。過去我們是不懂得這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我們所用的方法常常是倒行的，是從主觀的統統地去創造模範村、鄉、連隊……開始，而不是從原有村、鄉、連隊中去發現模範人開始，這是不符合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

，也就是主觀主義的。所以，我們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正確口號，由於我們在實際行動中的方法錯誤，結果就變成不能兌現的東西。

第二，爲什麼有時我們也創造出了若干的模範事業，但是常常不能夠持久呢？這也是由於前面所說的那種錯誤的思想方法而來的。因爲我們都把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口號提得很高而又沒有從發現原來模範人物的正確方法開始，爲了完成任務，就不能不使用外力，從別處湊集一批幹部送到那裡去進行突擊，去代替包辦，去「加油」，「打氣」。這樣，有時也能夠搞得熱火朝天，但這種熱鬧，既不是由於內在力量的「自力更生」，也不是從運動過程中去打下基礎，一旦這種代替，包辦，「加油」，「打氣」的外力一去，就好像去了氣門塞的氣球一樣，很快就消失下去了。這是自然的道理。

最後，就是我們在提出創造什麼模範的口號與計劃時，往往是採用多頭並進，全綫出擊的方式。例如，提出每縣創造一個模範區，每區創造一個模範鄉，每鄉創造一個模範村……沒有或者不會去運用「一鼓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集中力量，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進全盤」的工作方法與領導方法，所以我們也就常常是「貪多嚼不爛」，或者甚至「徒勞無功」！

(三) 我們缺乏鑽根究底。

我回想起來，我們在過去的工作當中，曾經有過不少好的東西。如幾年來，宿東、蕭縣等地的敵偽軍工作；前年冬季大「掃蕩」後，漂宿、淮泗等處的民兵工作；去年冬季疏浚柳溝河，濉河，擇河等工程中某些勞動組織；去年夏天，在泗南、鳳嘉、泗五、靈鳳等縣，曾經風行一時的「×戰大會」；第三、四等期輪訓隊的整風學習，淮北中學的反奸鬥爭，師直及各旅團營的反軍閥主義的鬥爭……這些東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從這種萌芽狀態東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對敵鬥爭，組織勞動生產，整風，審幹等各種指導方針。各地並根據着這些方針，作出了許多輝煌成績

。我們對於那些萌芽狀態的好東西，未能追根究底的把它鑽研一下，找出其發展規律，經驗教訓，使它們由感性的東西，上升為理性的東西，以便再回到實踐中去，推動我們的事業和繼續豐富我們的理論。我們沒有這樣做，因而使這些良好的萌芽，因為沒有得到我們適當的灌溉培養，也就未記滋長壯大，開花結實，而自生自滅，荒蕪枯槁了。我認為這是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不能很快提高，進步太慢的主要原因。

同時，我們也曾遇着許多困難，犯過許多錯誤，而這些困難與錯誤，也都因為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研鑽精神，多數沒有得到及時解決與糾正。例如：我們有許多工農幹部，因為積極參加工作，就誤了生產，其結果，他們的家庭經濟地位，有的不但沒有像一般羣衆那樣上升，反而日趨下降，弄得他們父母兄弟老幼孩子，大不滿意，親戚朋友，鄉鄰故舊，都無好評。因此，他們對於工作愈努力愈積極就常常愈說離羣索。在湖南等地，曾經發現過不少在黨認爲是「模範」的幹部與黨員，在羣衆中也大部對他們有「反映」（即說他們不好之處）。這些地方工農幹部，積極爲黨工作，與他們自己及其家庭生活困難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這一矛盾（這個問題，在陝北及其他地區，在提倡發展家庭生產中，已得到圓滿的解決），很早就被我們發現，迄我離開淮北止，向未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其他，如機關支部都搞不好；許多幹部感覺到工作中心太多，顧此失彼；掌握政策上「左右搖擺」，「朝令夕改」；幹部在工作中常常發生「疲塌」與「老一套」等問題，都是早已被我們感覺到的。只因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困難就長期的拖延着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錯誤也就一再的重複着，不能及時的糾正。因此，我們在工作開展與幹部進步上所受的損失是難以計算的。

假若，我們對於自己所作的各種工作，無論是成功的也好，失敗的也好，都能以追根究底的精神，加以調查研究、分析，綜合的方法，把它們鑽研一番，我想一定能够找出個「所以」與「竅眼

「來，而這個「所以」與「察眼」，就會成爲我們工作開展的「槓桿」與幹部進步的「酵母」！

(四)我們怎樣發揚幹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呢？

我們常常提出發揚幹部(一般黨員與羣衆都是一樣)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問題。但是，在我們的幹部中，却不斷發現有所謂「疲塌」(不積極)與「老一套」(無創造性)的現象，其故安在呢？這其中原因雖多，若從我們的領導方面來檢討，我認爲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的領導作風不够民主，工作方法不够積極。

平素聽到人家說我們不民主，總不大以爲然，覺得有點不大舒服。但果真自己反省一下，不民主的地方，不俱有，而且還不少呢。我現在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們從豫皖蘇邊轉移到皖北，所有地方工作幹部，都住在管轄附近的黃莊一帶休息，當時，就想利用這個時機，檢討一下路西這一段的工作，開始有許多幹部不肯講話(後來講話的是很多了)因之就叫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但他們寫出來之後，又都不肯署名，怕報復。結果，幹部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意見書，變成了「匿名揭帖」與「不記名投票」。第二個，是今年夏天，在仁和集會議上那場「風波」，主要的是過去領導作風不够民主的後面結果。第三個，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到花園莊輪訓隊去徵求那裡的幹部對於我們的意見。他們首先提出而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負責同志的意見，是否詭譎(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我想我們的幹部，像在整風輪訓隊這種場合，無顧忌的提出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意見，是他們應有的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一種權利；可是，他們竟把這種每個黨員應有的權利，當做他們發言的一種前提條件來提出，是類似得我們自己反省的。第四個，是同時的輪訓隊內，右立同志(他與狄克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掃蕩中犯了錯誤，經過我們指出，他們已承認，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已開始堅決轉變之際，又被決定予以撤職處分的)的反省筆記中寫着：「他有些意見，很想找我談談，可是他幾次走到我的門

外，又折回去了，始終沒有進去談，結果還是悶在肚子裡回去了！（也是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這種例子，如果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下，還可以舉出許多來。假若這種不民主的現象讓它繼續在黨內存在下去，而不迅速的加以克服，又怎樣能像毛主席在「論新階級」中所說的，表現出我們的一領導機關、幹部、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活躍，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呢？怎樣能使這些幹部，在工作中「提起勁來」，而不常常「鬱鬱不得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呢？

但是他們對我們並不是沒有意見。其所以不肯披肝瀝膽，開誠佈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就是怕說出來之後，上級常常不理會，或者還會因此出岔子，因此，他們就服膺那兩句「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緣強出頭」的格言，不肯去多咀多舌，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們既有意見，而又沒有說出來，悶在肚子裡，終覺有點不大舒服，就必然會發生「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會內不講，會外多講」等自由主義的現象。因此「小廣播」，發牢騷，說怪話等歪風，也就常常當作對於領導方面不民主的一種懲罰而出現。我在中央黨校看到許多過去好說怪話，發牢騷，不安心的幹部，自從毛主席及黨中央號召每個同志在整風當中「有話就說」之後，讓他們在黨的會議上痛痛快快的發了幾次牢騷，他們就心平氣和，比以前規矩多了。這些幹部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對黨是忠實的，對革命是有功績的，有些是 由於領導上的不民主而造成的。他們的不滿，若不用發揚民主的方式，使他們自己去把腦子裡那些壞東西及髒東西一概倒出來，使好的給發揮，髒的給洗乾淨，他們是難以接受別的好東西的，因為他們的腦子裡既然包藏着一部份（有時是很多數）髒東西，就是勉強灌一點好的東西進去，也很快就被原來裡邊那些壞東西傳染了。沒有民主，則好的意見得不到承認。如果一個人腦子藏着很多髒東西，還沒有得到倒出來之前，他們是看不到他們自己有什麼缺點的，就好像一個人未照鏡子之前，看不到自己的臉上有煤灰一樣，這樣你說他臉上有煤（有錯誤

），他們不相信（不接受批評），更不會自動的去洗臉（自我批評）。我們在去年的整風當中，也曾經不斷發生這類現象，不過未被我們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領導法則，而把他加以發展與普遍運用罷了！

在發揚民主的條件下，一般幹部對於工作積極性的提高與創造性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與互相作用的。假如在工作中被發揮了積極性的幹部，其創造性必大；同時一個在工作中被發揮了創造性的幹部，其積極性必高，那是一定的。蘇聯的斯泰哈諾夫，陝北的吳滿有、趙占魁，晉察冀的李勇等人，就是這一方面的具體例證。因為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已看到；他們不是專供別人驅使剝削的奴隸，而是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主人；而他們自己原有的不可避免的許多缺點（如狹仄等），也常常在自己的奮鬥與發展中洗掉了。

在發揮幹部工作的創造性上，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工作方法的科學化，我這裡所說的，就是：「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這兩個點。我們常常把工作中的創造性抽象化，神秘化了，認為這是那些大資頭頭，學問淵博，地位優越的小數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非一般人所能及。假如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我恐怕就有不少幹部答覆不出。這樣，你天天去喊叫發揮什麼創造性，還不「見鬼」麼？

我認為我們所需要的創造性，並不是那些「奇技爭巧」與能「降妖捉怪」的東西，而是那些凡是能為羣衆興利除害，能幫助羣衆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能，戰勝敵人，解脫剝削壓迫，推動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任何發明與發現，不論是大小與多少，都是應當為我們所發揮並發揚的創造性。因此，瓦特的蒸氣機，馬克斯的資本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固然是人類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創造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大發揚而特發揚，而吳滿有等人的「雙工廠」「札工廠」，趙占魁的工作方法、工作態度與管理工廠辦法，劉建章的合作社經營辦法，以及夏陶陶的教學方針等等，也同

樣是應當被我們所發揮與發揚的有偉大創造性的東西，而這些歷史人物的創造性之產生，既不是神人傳授，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從那些具體的現實的極平常的客觀事物與環境出發，去不斷實踐，反覆研究而得的結果。瓦特的蒸氣機是從一個開水壺蓋子受蒸氣衝擊而跳動開始研究而得的結果，馬克資本論是從研究眼前的一般商品開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從研究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與十月革命後的國際環境出發。吳滿有等人的「變工隊」、「扎工隊」是從研究陝北這種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生產如何變為互助生產出發。趙占魁的工作方法與工廠管理辦法，是從研究一個人數不多的手工工廠生產出發。劉建章的南區合作社經營辦法是從研究一個僅有一百六十名社員，一百一十九元九毛邊票的股金的小小的合作社開始。夏陶然的教學方針與辦法，也是從研究一個家庭不能維持生活的中瀟小學出發。因此，凡是願意「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埋頭苦幹、深思熟慮、決心為羣衆服務、而又肯向羣衆學習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就必然有積極性，而且一定能夠創造出一些造福社會的新東西出來，是可以斷言的。因此，假若我們能夠好好的發揚黨內外的民主作風，為黨內黨外的幹部與羣衆造成一種發揮他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環境，告訴他以「實事求是」，「打開腦筋」的分析的科學思想方法，再加上一種為羣衆服務向羣衆學習的羣衆觀點，則所有那些對黨對革命忠誠的幹部與羣衆，不用說一定會朝氣勃勃日新月異；就是有些兩條心的份子，也會在這種「治病救人」的民主作風之下受到感動，在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前心服，引起他們自己的坦白與轉變的。在他們自己坦白轉變之後，也可以在工作中創造出一些新東西來，有些並且是很有價值的。在延安已有很多的實例。這樣一來，所謂工作中的創造性，就不是某些少數個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更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羣衆性的東西，變成了一種羣衆運動。這樣一來，在我們幹部所常有的那些「疲塌」，厭倦，消沉，苦悶與「老一套」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的現象，也就不攻自破一掃而光了。

(五)爲了誰？對誰負責？

假使向我們黨的幹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誰？那應當對誰負責？」我相信有許多同志都會這樸的回答，都是爲了黨與上級，那應當對黨與上級負責。這當然也是對的，既然是黨與上級交給他們這些任務，他們是應該向黨與上級負責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種回答，還不能滿意，因爲還不完全對。假若再問一下，整個黨的工作又都是爲了誰？又都應當對誰負責呢？我想恐怕就有些同志答不出來或者答覆得不適當。

我們的黨既是爲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謀解放的，那麼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並應當對他們負責，正是當然的。但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真理，在我們的同志中，尚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還沒有把它搞通，因之在實際工作中，也就常常犯錯誤，使黨與自己脫離羣衆，自羣衆中間對立起來。

黨所做的各種工作，不僅減和減息，增加工資，種棉植樹，挖河築堤都是爲了羣衆，是羣衆自己的事；就是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等，也還是爲了羣衆，也是羣衆自己的事。但是因爲黨的利益與羣衆的利益應當完全一致的這一基本思想，在不少幹部當中，沒有把它弄通，於是，在實際工作中，就常常不是眼睛向下，面向羣衆，爲了羣衆，對羣衆負責；而是眼睛向上，背向羣衆，單純的爲了黨，向黨與上級負責。在他們心目中，是把黨和上級與羣衆對立起來，把對黨對上級負責與對羣衆負責對立起來。因此，就不免在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工作中，常常發生強迫、命令、打、罵、關、罰等等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的現象。在酒宿就曾經因爲徵收公糧發生過迫死老百姓的事！就是在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棉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中，也不止一次的發生過強迫命令，以至打、罵、關、罰的事情。酒南就曾經有一個工作同志，因爲增加工資問題，打過一個僱工兩個耳光！這好像是一件怪事，然而這却是事實。正因爲有些幹部，對於爲誰負責？對

誰負責？即黨與羣衆的關係及怎樣去領導羣衆這一基本問題，在思想上沒有溝通，於是就不備徵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等事，在羣衆看來，都是爲着黨、政府、軍隊幹的，而不把這些看作羣衆自己的事，常常發生隱瞞、誑報、違抗、逃避的現象；就是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種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在有些羣衆看來，也好像是爲了那些工作同志去完成上級所給予的任務，而不得不繳似的，因此，什麼「明減暗不減」，「明加暗不加」，拖延敷衍，應付「差事」的現象，也就都來了。這就叫作「事與願違」。

有些幹部，爲了有效的去完成黨與上級的任務，對黨與上級負責起見，有時便不惜對羣衆採用強迫命令，以至打罵威迫的方式。可是，在這些幹部犯了這種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的錯誤之後，爲了衛護黨與上級在羣衆中的影響與威信起見，就不能不給他們一種處分。這對於那少數乘機搗亂，「兩條心」的份子，固然是罪有應得，人心稱快；但對於那些真正是忠心耿耿，爲了黨與上級，對黨與上級負責的幹部，則是一兩頭不討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說出」了。

我們的許多幹部，這種缺乏羣衆觀點的態度，不但在執行政策上是如此，對各種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的採用與實施上，也是一樣。我們已建立或要建立的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都是爲了廣大羣衆的利益與對敵鬥爭之所需，那麼，假若現有的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

在廣大羣衆的實際生活中

，已成爲一種「官話」，或者未建立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羣衆看來，已成爲必要時，前者如鄉村及連隊中某些繁雜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後者如戰鬥英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會議，擁政愛民與擁軍制度等，我們就應該根據勞動大羣衆實際生活的需要，大膽的向上級建議取消或建立，或者就直徑的把它取消或建立，才是對的。但是過去我們多半沒有這樣做。有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廣大羣衆看來已經是沒有意義，我們的幹部常常藉口于這是上級的指示與規定，不敢稍

有變更。同時，某些東西，在羣衆的實際生活中已成爲像空氣一樣的需要，我們却又藉口于上級沒有決定與指示，也不敢建議或自動的增設。這些都是缺乏真正羣衆觀點的表現，只要有真正的羣衆觀點，就不會採取此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自然這種從真正羣衆觀點出發的負責態度決不能被那些黨性不強的幹部作爲不服從組織領導，對黨獨立性的藉口。一九四二年冬與一九四四年春，西北局的兩次高幹會議，對於許多會議制度與組織形式，例如軍隊中的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詳見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已經這樣做了。他們這種革命而不是保守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那裡，羣衆中有幾種相當普遍而值得我們注意的談話：一種是「天皇那裏稅多，頑固那裡罪多，新四軍那裡會多」！又一種是：「新四軍什麼都好，就是開會太多不好」！再一種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人來講話」！我認爲這是對於我們在開會與講話問題上，缺乏羣衆觀點的主觀主義的同志們的一種辛辣的諷刺，然而我們有很多幹部，並沒有從這種諷刺、羣衆的正確呼聲裡去得出應有的教訓。對於這種呼聲充耳不聞，能夠算是有羣衆觀點嗎？

「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一正確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不僅在制定鬥爭綱領時要這樣做，不然，你所製定的鬥爭綱領，就是「無的放矢」；而且在選擇工作方式時，也要這樣做，否則你所選擇的工作方式，也是「張冠李戴」保存碰釘子的。我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常常是信心十足的乘興而往，垂頭喪氣的敗興而歸，有許多就是這個緣故！

「變工隊」、「扎工隊」、「磨房班」、「秧歌」、「衛生合作社」等，是今天在陝北的生產文化、衛生運動中最爲廣大羣衆所了解歡迎，能夠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陝北的整活運用這種形式、方法、有效的達到組織勞動，發展生產，豐衣足食，普及文化四個大目標。這種經驗，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總之，我們應當根據着廣大羣衆的鬥爭經驗，覺悟程度，歷史傳統，文化水平，生活習慣等等

具體情況，去製定我們的鬥爭綱領（工作要求與工作決定等）與選擇我們的組織形式及工作方法，絕不能單憑在我們腦子裡所想出來的鬥爭綱領與工作方法，拿到草萊頭上硬套，或者拿了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作為我們測量廣大羣衆的覺悟程度與積極性的程度。這就好像我們應當照著腳去做鞋，而不能照著鞋去做腳是一樣的道理。

（六）我的聲明與希望。

上面我所寫的這幾個問題，是我個人在黨校幾個月學習當中，對於過去工作的一點初步反省，而這種毛病，我看在我們幾個人中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此，我要順便聲明一下的，就是：我在上述幾個問題的反省中，幾乎都是講的錯誤與缺點，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就沒有提。但這絕不是說，我們幾年來的艱苦鬥爭與各項工作沒有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的正確的好的東西有很多的。我們是執行了中央與華中局的正確路線，並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中，我們就根本不能在那裏堅持鬥爭與開展工作，更說不到還會有很大的發展了。並且我的意思，也不是有意光說壞的，使我們自己洩氣。我之所以這樣，是由於我認為，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中確實存在着缺點，我們還沒有搞通領導方法上的全盤問題。就拿我們所有正確的好的東西來說，許多也還是停於一種摸索階段，許多東西還沒有被我們系統化，條理化，並沒有發展到高度自覺的階段。這就是由於思想領導上的薄弱，而這種思想領導上的薄弱，正是我們在領導工作上的最主要缺點。這些就是我們在整風學習當中，對於整風不得其門而入，不大感覺興趣的主要原因。不知你們以為然否？

最近的國際形勢，對於我們，真是空前有利。近幾個月中的淮北抗敵鬥爭，也是最近幾年來沒有過的開展，今後的形勢，有可能更好，我們的各種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開展，但是，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幾年的抗日戰爭中，我們也吃過多少大虧，而這些虧，又多半是在我們獲得很大勝

利與發展之後吃的，這種例子，可以舉出好幾滴。總之，在抗日戰爭中，在一個比較大的勝利與發展之後就要受一次損失，這幾乎成了一定規律。同時，有不少進步人士與中間人士，在我們困難時，曾經靠近並幫助過我們；在我們勝利與發展時反而離開了我們。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反省與深思的。俗諺說：吃一虧，長一智。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們是決不怕困難的，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是不怕指出自己缺點，因為我們對於我們事業的正義性是認識得清楚的，我們是有完全的勝利信心的，我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成績又是很大的，只要我們能認真反省缺點，認真打通思想，提高自覺性，去掉盲目性，我們就會大進一步，我的信主要的是作為自己反省寫給你們看看，同時也希望你們考慮一下。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變為引玉之磚。寫得太多了，不再寫下去了。致以同志的敬禮！

劉子久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